

懷念恩師本會理事龔煌城院士

洪惟仁

在我跌跌撞撞的一生中，遇到的貴人無數，他們都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伸出援手，使我化險為夷，安渡難關。其中有兩位恩師，雖然不是我在學中正式修過學分的先生，卻影響了我一生的為人、為學，恩重如山。其一是引導我走進語言學大門，學會音韻學、方言學、語言地理學以及語言調查方法的鍾露昇老師；另一位是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把我拉回到語言學的學術殿堂，提拔我、教導我的龔煌城老師。在現代這個社會，以師徒傳授而成就學術傳承的，大概只有兩位先生與我了。

我大學唸的是文化學院中文系，碩士研究所唸的是台師大國文所。在那裏，正式的課程中只能學到傳統的聲韻學。我高中時代就著迷於閩南語研究，是為了研究閩南語才去念中文系的，但是中文系的傳統課程不能滿足我的求知欲。有一天，一位高中同學徐清茂君對我提起師大國文系有一位留美回國的教授，在他們輔仁大學兼課，教語音學、聲韻學，並且研究閩南語，叫做鍾露昇。我知道了這個消息，非常高興，立刻去拜訪他，先生也很高興收我為徒。我從先生那兒不但學了語音學、新派的聲韻學、結構主義語言學，最重要的是田野調查方法。當時羅傑瑞(Jerry Norman)還是學生，正在寫博士論文，來台灣和先生一起做南島語以及閩北語的語言調查，我也在旁學記音。除了旁聽老師的課程之外，不斷的實習、討論奠下我後來獨力進行方言調查與研究的基礎。鍾先生不但是我語言學的啟蒙師，也影響了我一生的研究志向。

可是當我研究所畢業的時候，一個天大的不幸降臨到我的身上。我被迫到牛奶奶島(Green Island)大學「深造」，在那兒唱了六年八個月(1972年9月16日至1979年5月15日)的「綠島小夜曲」。這個事件不但打碎了我出國學語言學的夢，也把我的人生方向徹底扭曲了。

1979年回台灣，翌年結婚、又翌年生子，一直在鄉下或深山過著筆耕生活，同時收集閩南語文獻，進行閩南語禮俗、民間文學和方言的研究。1985年2月起，我開始有計畫的進行全台灣的方言調查，我的親戚、朋友、同學遍佈全台，我常藉口看他們，一住就是幾天，由他們帶著進行了遍佈台灣本島及大小島嶼的方言調查。我把調查的結果發表在雜誌上，後來集為《台灣方言之旅》，1992年出版。當時的調查報告就成為我後來正式踏入學院殿堂的契機。

雖然我採用的是學院派的語言調查方法，可是我的身份卻是「民間學者」，我行文的筆觸充滿了感情，所寫的文章不像是冷靜而嚴謹的學術論文，倒像是通

俗語言學的隨筆、雜文。可是因為這些文章都有田野調查的基礎，引起部分語言學家，以及台灣文化、文學和台灣史研究者的興趣。那個時候我的文章刊出率很高，在文化界闖出了一點名氣。學院派第一個注意到我的是時任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的台灣史學者張炎憲教授，當時中研院「台灣史研究室」還沒有成立，他是「台灣史田野研究計畫」（1986-1987）執行小組成員，同時兼任《台灣風物》主編。我因為常在《台灣風物》投稿而認識了他。1987年3月他推薦我到計畫中擔任兼任助理，負責編輯閩南語書目。當時的計畫有幾位專任助理，如翁佳音、詹素娟、洪麗完、李季樺…等人，後來都變成台灣史的名家。我在那裏度過快樂而豐富的一年。

在中研院，我呼吸到台灣最高學術機構的學術氣氛，認識了好幾位關心台灣研究的以及語言學的頂尖學者（李壬癸院士、丁邦新院士、何大安院士也是那時認識的），其中可以稱為奇遇的，是認識了龔煌城院士。

龔先生是有名的漢藏比較語言學學者，也是西夏語學者。在他專業的研究領域裡，李壬癸教授稱讚他的成就是無可取代的，無人敢望其項背，可惜又後繼無人。但是許多人只覺得高山仰止，卻不一定了解先生的成就，至於其他專業以外的大小事就更沒有機會了解了。

即使我曾經在台灣大學旁聽過龔先生的「漢藏比較語言學」，也拜讀過幾篇他的論文，但是漢藏比較語言學和西夏語畢竟不是我的專業，我在這方面了解不深，不敢輕置一詞。最近李壬癸院士有一篇〈我敬佩的龔煌城院士〉（刊 2010 年 10 月 25 日《書和人》和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39 No. 1 (2011)），深入淺出，值得一讀。我這裏想要談的是他專業以外的表現，希望藉此讓學術界的先生們以及語言學的後學了解龔先生的另一種風範。

龔先生雖然是冷靜的語言學家，但是有冷靜頭腦的，可能同時也是熱血的人，他就是這樣一個理性與感情的矛盾統一體。他不只關心自己的學術研究、學術成就，他也非常關愛家人、朋友、學生，關心台灣，並且熱心提攜後進。

由於關心台灣研究，龔先生常常參加台灣史田野研究室的聚會。他對我寫的田野紀行以及閩南語研究的文章很有興趣，還曾經來聽我演講，關心備至。有一次，龔先生對我說：「我準備申請一個閩南語方言調查計畫，想請你來當專任助理，你願意嗎？」那時我無業，閩南語方言學又是我的一生志業，我哪有拒絕之理？過了幾個月，龔先生打電話告訴我說：「國科會已經通過了，你快來。」可是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那時我正好受邀到日本、美國進行三個半月的巡迴演講，機票都已經買好了。我說：「可以等我回來嗎？」龔先生答應了，這個計畫就等我美國回來，才在 1988 年 5 月開始執行。

有一段插曲，就是龔先生正申請這個計畫的時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所長丁邦新院士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個中國人的想法〉（1987 年 4 月 9-10 日《聯合報》）的文章，從語言問題談到省籍問題，說國語政策沒有錯，省籍問題沒有

意義；然後忽然跳到政治問題，說國人素質太低，沒有條件實行民主，主張回到訓政時期。文章發表後引起一場論戰，當然有贊成者，但是批評的文章也不少，我是其中之一。1987年5月28日我在《自立晚報》副刊發表了一篇〈入境隨俗、落地生根——讀「一個中國人的想法」有感〉指出學校及廣播電視禁止台語的語言政策已經造成台語的萎縮，台灣文化的危機；外省人既然遷居台灣，就應該學台語……。那篇文章收在拙著《台灣語言危機》（1992:181-193），請自行參閱，我就不在此贅述了。

重點是，我在文中批評中央研究院來台四十年沒有做過全台灣的方言普查，即使是點的調查也少得可憐。我說：「史語所的經費來自台灣人民的血汗錢，不研究台灣話，研究什麼呢？」以語言學的學術地位來看，我和丁先生真有天壤之別，我這個小蝦米真是對上大鯨魚了。

龔先生當然知道我和丁先生筆戰的事。但是他也不在意，依然向國科會申請了「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計畫。當時丁先生正好當所長，丁先生要是心胸狹窄，挾恨報復的話，大可以加以勸止，甚至杯葛。事情並不是這樣發展的。後來龔先生告訴我，當時計畫提出時，丁先生只說了一句「你這是為洪惟仁申請的嘛。」不但沒有反對，反而樂觀其成。丁先生雖然在某些思想上和我南轅北轍，但是他畢竟是個大學者，他那種容納異己的雅量與學者風範，至今都令人敬仰。

最令我感動與懷念的是龔先生並不善於逢迎，明知我和丁先生有「過節」，也不避諱，仍然申請這個計畫，並且持續了六個年期。閩南語方言研究並不是先生的志業，他沒有責任為了叫我去研究院工作，而惹這個「麻煩」。當初先生只要一念之間，改變了主意，就沒有這個研究計畫，當然也沒有以後的洪惟仁。我一生的命運會徹底改變。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上，這樣的前輩恐怕極其稀覲吧？

這個計畫主要的工作是進行全台灣閩南語的方言調查，我在先生門下完成了6大冊的研究報告。先生雖然信任我去設計問卷，進行調查工作，但並不是放手不管，隨便我怎麼做。從問卷的設計，到報告的撰寫都是在他的監督下完成的。這套報告至今沒有正式出版，但是成果報告的影印本在閩南語學界廣泛流傳，常常被引用，沒有人敢說是門外漢寫的東西。是在先生的指導下才有這個研究成果。

雖然我從1985年就開始自力進行閩南語方言調查，但那畢竟不是正規的方言研究。我是擔任龔先生的助理之後才知道嚴謹的學術研究是什麼。

我剛到中研院報到的時候，先生客氣的對我說：「你在這裏雖然是助理的身份，但其實是請你來做研究的。」換言之，先生一開始就沒有把我看成一般的助理，而是看出了我的研究潛力，刻意要栽培我的。除了工作報告之外，從1989年我入龔先生門下到我離開的1996年，我發表了45篇論文，大部分的論文在發表前都經過龔先生一個字一個字的看過。沒有先生的指導，不管研究助理做多久，我都進不了學術的大門。

直到1996年7月，我在中研院一待就是8年多。雖然如此，實際上執行「台

「台灣漢語方言調查計畫」只有 5 年多。這是因為第二年先生就為我申請了一個「約聘助理研究員」的職位，兩年任期（1989-1991），中止了調查計畫，讓我做自己的研究。正好張炎憲教授推薦我參加「台灣文獻書目解題」的撰寫計畫，我負責「語言類」。利用這個機會，我看遍傅斯年圖書館和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所有閩南語辭書及相關文獻，並進行了閩南語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後來，1993 年出版了 10 大冊的《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1996 出版了我的兩本書《『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和《台灣文獻書目解題：語言類》，主要是利用這兩年的時間撰寫的。沒有先生提拔我擔任助理研究員，讓我專心讀書，這三本大部頭的書不可能問世，我對閩南語方言文獻也不可能這麼熟悉，對閩南語的歷史也不可能有深入的研究。

另外有將近一年的時間（1993 年 9 月至 1994 年 3 月），我受交流協會聘為「長期聘用專門家」在日本天理大學訪問研究。天理大學有豐富的典藏，我在那裏寫成了〈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龔先生精通日文，對於高本漢也很熟悉，因此對這篇論文特別有興趣，在我撰寫此文時從頭到尾細讀一遍，給我很多修改意見。這篇論文 1994 年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台灣史研究》第 1 卷第 2 期發表。

中止計畫的這三年間，我等於寫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博士論文，而龔先生就是我的指導教授。這些論文後來就成為我「直升」副教授的本錢。1996 年離開先生的羽翼、進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博士班那一年，靜宜大學聘我去兼任語言學概論等課程。當時我連講師證都沒有，鄭邦鎮主任知道我已經發表了許多論文，就用我的學術論文向教育部申請副教授資格，前述龔先生指導我寫的小川尚義研究，就是主要論文。我終於沒有經過講師、助理教授，直接得到副教授證，這種事在現代的台灣也是很罕見的例子吧？這除了感謝靜宜大學的禮遇和鄭主任的貴助之外，我更感謝龔先生的知遇之恩。因為沒有這八、九年來先生的栽培與指導，我絕對沒有能力寫那麼多質、量受肯定的論文，當然也沒有辦法通過副教授的審查，我人生的道路會走得更辛苦。

我不是一開始就會寫論文的。起先，先生看我寫論文的風格，說：「你寫論文像寫隨筆一樣，這是不可以的，寫論文就是不能帶感情。」我很快就學會了。可是到了後來，文章的感情越來越少，隨筆反而寫不出來了。

先生教我說：「你不要怎麼想就怎麼寫。有一分證據說一番話，沒有證據要保留一點。學問是天下之公器，你一旦發表，大家眼睛睜得大大的都在挑你的毛病。所以下筆的時候，不要以為自己說了算，要設想人家怎麼批評。自己先挑自己的毛病，才不會給人挑毛病。」在學術界，龔先生的論文是出名的嚴謹，大概就是秉持了這個寫作原則吧？正因為先生常常挑我的毛病，我也學會了挑自己的毛病，學了一點治學和行文的嚴謹。

龔先生批評別人論文也是非常嚴格的，可是他的態度不失溫和與中肯，這一點我卻沒有學好，我往往失之嚴苛，不論是研討會或寫文獻回顧都有一種難以控

制的嚴厲。記得有一次，我寫論文批評王士元先生的 flip-flop 說 (Wang 1969)。我說「火雞」廈門話 he-kue 和漳州話 hue-ke，開合口對調只是一種巧合，原來有歷史的原因，無所謂 flip-flop（簡單的論述參見〈方言調查與語言學理論的辯證關係〉，收入《台灣方言之旅》頁 87-63）。龔先生看了我的論文，就去把原文找出來研究，然後告訴我，說：「你的論證沒有錯，不過語氣太嚴厲。王先生只是說『假設』廈門話 he-kue 和漳州話 hue-ke 開合口對調如果是歷史的變化，那必須是一種同時演變 (coincident)，不是在做歷史擬測。並且他也說明這種演變也可能是兩個方言沿著完全不同的路線發展的，你只是證明了演變的事實。」他教訓我說：「有些後輩學者以為不批評前輩，好像就不能突顯自己的成就，所以不是否定前輩的成就，就是誤會或過度解讀前輩的文意。急著出頭，有時反而傷了自己。」先生為了挑我論文的毛病，竟然把原文找出來研究這件事已經讓我嚇了一跳；又被他這樣一教訓，知道自己誤會了前輩的文意而肆意批評，以炫耀自己的成就，頓時羞愧萬分，有點孫悟空遇上了如來佛的感覺。龔先生那次的教誨給我很大的刺激，時時引以為戒。

當然，那篇論文發表時改了口氣，也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但是好幾年以後有一次聽蔡維天教授演講，他說：「以前的學者是站在前輩的肩膀更上一層，現在的學者是踩在前輩的臉上跳過去。」聽在耳裡，心裡不免抽了一下。

先生在開會時，很少說話，大部分的時間都靜靜的聽。可是他並非鄉愿，在關鍵時刻總是會發言，每一次發言都深中肯綮。因為他說話不多，所以一旦發言，常有一言九鼎的權威。這種修養與能耐我是永遠學不會的。

我在中央研究院，雖然只是龔先生的助理，但是我佔用了一間研究室，並且不照時間上下班。我有時出田野，一出門就是一兩個星期，也不用向龔先生報告，龔先生也從來沒有說過什麼。最後幾年史語所語言組有一個新規定，就是助理要集中到一間助理室，按時上下班，我很不習慣。當時丁邦新院士出國在外，但是研究室還保留著，龔先生便替我向丁先生情商，把他的研究室借我用，直到計畫結束我離開。先生對我的關愛有如此者！

我在史語所還可以參加每月一場的講論會，跟別的研究員一起討論，宛然是一般研究員。在外面，人家誤以為我是研究員，稱呼我教授，但是我自知不是研究員，也不是教授。在史語所一年過一年，越來越覺得心虛。雖然學了不少，但別的研究員演講時，有些語言學理論聽不懂，尤其是 Chomsky 的理論，更是一頭霧水，心裡很難過。

我跟先生談了自己的感受，說：「我想去唸個博士。」先生說：「很好啊！你應該去接受完整的現代語言學訓練，將來的路才會更寬廣。」於是，1994 年我就去清華大學旁聽湯廷池先生的 syntax 和蕭宇超先生的 phonology。第二年我幸運地考取了清大語言研究所博士班。

那時 (1995) 我已經五十歲了，我的心裡難免有一點急，希望趕快去拿個博

士，趕快找到正式的職位。可是「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計畫還沒有完成，還有一年的調查工作。我要求先生說，是不是可以讓我一面工作、一面唸博士？先生說：「不可以！你這樣博士班課程修不好，方言調查也做不好，兩不成。你暫時申請保留學籍，等明年調查工作完成了，再專心去唸博士吧。」我聽了先生的話，把計畫完成了，第二年（1996）才去唸清華博士班，成了清華大學最老的學生，當時語言所的先生們大部分都比我年輕。

先生的話是對的。如果那時執意去唸博士，因為學生沒有資格當專任助理，我必須放棄方言調查的工作。那個計畫不曉得要怎麼收尾。如果沒有圓滿的完成計畫，那不是我一生的遺憾就是龔先生的遺憾。

我把整個不惑之年奉獻給這個計畫以及相關的研究，但是沒有白費，這個經驗給我建立了腳踏實地的語言學基礎。7年的博士生雖然過得辛苦，卻很踏實的完成了學業。博士論文考試的時候，龔先生已經當選院士，仍然不辭辛勞，當我的口試委員，一個字一個字把我的論文看過，給我提出許多修改意見。2003年6月我順利地由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畢業，獲得了博士學位。

印證了先生「以後的路會更廣」的話。博士班修完學分的1999年，我就應聘到元智大學擔任專任副教授，博士後第二年的2004年2月就升任教授，同時轉調到台中師範學院創建「台灣語文學系」，並應聘為系主任，一帆風順。用世俗的話，也不妨說是「平步青雲」吧？但這一切的一切都要感謝先生的栽培，沒有先生，就沒有今天的我。

離開中研院到今天15年的時間，我發表了4本專書，將近50篇論文，至於研討會論文就更多了。我今年65歲了，卻仍然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計畫著退休後要寫這個、寫那個。所以如此，除了學術上的興趣，心中時刻想著的是不能辜負了先生的栽培之恩！如果我不爭氣，在學術上沒有什麼成就，即使得到再高的地位也不能算是報恩吧？這一點我是有點感觸的，我對待學生，也學習著龔先生愛護我一樣愛護他們，他們畢業後能夠找到好的工作我當然高興，但是如果他們在學問上精進，做出好的研究成績，我更加光彩。容許我把所有的成就獻給先生，但望不會給先生「漏氣」。

這些年，我和先生見面的機會不算少，不過幾乎全部是在學術研討會、台灣語文學會理監事會、教育部國語會開會的休息時間，見面聊幾句，或是打電話拜個年。一方面總以為先生很忙，不好意思打擾，有時要去看他，先生也客氣說不要。平時總以為來日方長，什麼事都不會發生，現在才知道，這個疏忽造成了我對先生永遠的虧欠。

年前，驚傳先生得了癌症，入院化療。先生出院回家時，我打電話給他，說要去看他，但是先生說怕感染，不讓會面，說在電話裡談也一樣。所以直到先生病危，我都只能偶而打個電話問候一下，聊盡為生之道，什麼也沒有做。後來先生的聲音越來越虛弱，到最後，我怕他說話累，甚至不敢多說話，有話，只能跟

師母說說，請師母轉達了。

2010年9月11日早上，先生終於敵不過癌魔的折磨，與世長辭了。驚聞這個消息，不知道怎麼表達心中的哀思。沒有想到先生走的這麼快，連最後一面也沒有見到，成了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我去靈堂祭拜了兩次，每次看到淚流滿面的師母，不知怎麼安慰她。師母和先生鰈鰈情深，一生恩愛，忽然永別，我想任何言語都無法撫平她的傷痛吧？這些日子來，師母為了守護先生，已經骨瘦如柴，但望師母保重身體，讓時間的流逝洗滌心中的哀傷，早日恢復健康與平靜。

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留下的寶貴研究與為學方法，他的學者風範與風度，將永遠受到學界敬仰與學習，對於師母和兒孫而言不止是永遠的懷念，更是永遠的驕傲；他對後學的關愛、提拔與教導，將令所有學生，尤其是我以及妻兒永遠感謝與懷念。

原稿以〈懷念恩師：本會理事龔煌城院士〉為題
刊《台灣語文研究》第六卷第一期（2011年3月）
2011年6月5日，2016年5月6日再略作修正